

大党之“难”与大党之“治”

李珊珊

我们党已经发展成为具有重大全球影响力的世界第一大执政党。百年大党历经艰辛而风华正茂,根本在于拥有强大的思想武器。

首先认识大党之“大”与大党之“难”

我们党的世界上最大的政党,大就要有大的样子,同时大也有大的难处。大党之“大”,体现在多个方面:

一是规模体量之大。截至2025年12月31日,我们党员总数为10128.6万名,是当今世界党员人数最多、组织规模最大的马克思主义政党。

二是理想信念之大。我们党始终坚守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以实现人类解放为己任,胸怀“国之大者”,具备长远战略眼光。

三是格局胸襟之大。我们党始终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始终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能够统筹兼顾不同行业、领域、区域、群体的利益诉求,统筹协调长远利益和眼前利益。

四是使命责任之大。我们党肩负着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为世界谋大同的伟大使命;肩负着推动科学社会主义在21世纪赓续发展、焕发生机的重大责任。

大党之难,难在何处?在二十届中央纪委二次全会上,习近平总书记以“六个如何始终”精辟概括了我们党面临的独有难题,即:如何始终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如何始终统一思想、统一意志、统一行动,如何始终具备强大的执政能力和领导水平,如何始终保持干事创业精神状态,如何始终能够及时发现和解决自身存在的问题,如何始终保持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

其中,初心使命是党的价值坐标,团结统一是行动前提,执政能力和领导水平是本领支撑,精神状态是持久动能,自我纠错是内在要求,政治生态是发展保障。这六个方面系统阐明了新时代解决大党独有难题必须统筹抓好的关键领域,彰显了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深沉的忧患意识与高远的

战略远见,为我们解决大党独有难题提供了方向指引。

习近平党建思想提供破解大党独有难题的根本遵循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针对党内存在的各类突出问题全面发力、系统施治,锻造了高度团结、坚强有力的中国共产党,构建起了困难面前万众一心、众志成城的党群关系,形成了习近平党建思想。“十四个坚持”深刻揭示了破解大党独有难题的道理、学理、哲理。

习近平党建思想把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作为党的建设的永恒课题和全体党员、干部的终身课题,使党的初心使命贯通于党的建设的过去、现在和将来,成为党的建设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习近平党建思想提出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特征,党的初心使命又通过党的领导贯穿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建设的各领域各方面各环节;提出党的领导制度是我国的根本领导制度,党的初心使命不仅以制度的形式得以确立,又贯穿于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各领域各方面各环节。这就从理论、实践和制度上解决了党如何始终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的问题。

习近平党建思想揭示了党的领导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中的决定性意义和统领性地位,党中央的集中统一领导在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中的关键性作用;把保证全党服从中央、坚持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作为党的政治建设的首要任务,提出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把党中央的集中统一领导贯穿于党的建设的各方面,并且通过党的各方面的建设来维护党中央的集中统一领导,实现了党的领导党的建设相贯通,确保了党的团结统一,从根本上解决了党如何始终统一思想、统一意志、统一行动的问题。

习近平党建思想把坚持全面从严治

面从严治党,核心是加强党的领导,基础在全面,关键在严,要害在治。按照这一要求,作出了加强党的政治建设、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纪律建设,把反腐败斗争和制度建设纳入工作布局的战略安排;以系统思维和科学方法完善全面从严治党体系,推进了管党治党内容全覆盖、对象全覆盖、责任全链条、制度全贯通,全面推进党的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解决了党如何始终能够及时发现和解决自身存在的问题,保持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的问题。

习近平党建思想把坚持落实管党治党的政治责任作为全面从严治党的具体举措,要求各级党委(党组)担起管党治党的主体责任,纪委担负起监督责任,党委(党组)书记担起抓班子、带队伍、保落实的第一责任,领导班子其他成员按照职责分工落实好“一岗双责”,党员、干部严于律己和互相监督、互相提醒帮助,落实好管党治党的具体责任,构建起了主体明确、要求清晰的责任体系,以责任主体到位、责任要求到位、考核问责到位推动管党治党责任落实落地的同时提升了党的执政能力和领导水平,提振了干事创业的精神状态。

以大党之道引领大党之治

习近平党建思想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体系中具有特殊重要地位,是推进大党之治的根本遵循和精神法宝。以大党之道引领大党之治,本质上就是通过党的领导和党的建设,引领和保障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把管党治党的成效转化为治国理政的实际效能。

以大党之道引领大党之治,要始终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两个确立”“两个维护”是实现党的团结统一的政治前提、思想基础和组织基础。要完整准确深入地学习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刻理解党的崇高的政治信仰、远大的政治追求,肩负的政治使命,以在党言党、在党忧党、在党为党的政治自觉,把准政治方

向,提高政治能力,构建积极向上的政治文化,营造良好的政治生态,始终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

以大党之道引领大党之治,要始终牢记初心使命,把造福人民作为管党治党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必须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党的奋斗目标。始终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畅通群众监督渠道,把人民群众的满意度作为检验管党治党成效的根本标准。

以大党之道引领大党之治,要深入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这一新时代党的自我革命的伟大实践,以党的自我革命引领伟大的社会革命。全面从严治党是新时代党的建设鲜明主题,要以政治上的警醒,紧盯党内存在的突出问题,权力运行中的风险隐患,持续纠治“四风”,一体推进“三不腐”,清除一切损害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的因素。不断完善党的自我革命制度规范体系,形成靠制度管党、靠制度管人的长效机制,以党的建设成效带动全社会形成风清气正、干事创业的良好风气。

以大党之道引领大党之治,要主动落实管党治党的政治责任。领导就是责任,广大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要深刻认识全面从严治党是全党的共同责任,按照职责任务不断增强责任意识,切实把全面从严治党各项要求一贯到底、落地落实。

以大党之道引领大党之治,要把管党治党成效转化为治国理政的强大动能。要不断提升各级党组织和全体党员的执政能力和领导水平,充分发挥各级党组织、全体党员在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中的引领性作用,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主动识变应变求变,主动防范化解风险,不断开创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新局面,带领中国人民向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不断前进。

(作者单位为湖北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省委党校分中心、湖北省委党校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

人才是第一资源,并非简单的发展论断,而是植根马克思主义理论、赓续百年党史实践、顺应时代发展大势的科学结论。厘清蕴含其中的理论逻辑、历史逻辑、实践逻辑,读懂人才的本质属性、发展脉络、时代使命,才能全方位建强人才队伍,夯实中国式现代化根基,推动民族复兴伟业行稳致远。

从马克思主义理论中读懂人才何以成为第一资源

人才是第一资源,根植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立足生产力发展本质规律,跳出传统技术资源认知,重构新时代人才价值体系,是马克思主义人才观中国化时代化的必然要求。

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揭示,人是生产力中最活跃、最革命的因素。这一科学论断深刻揭示了人在物质生产过程中的主体地位和能动作用,为确立人才是第一资源奠定了坚实的哲学基础。在劳动三要素中,唯有劳动者具有主观能动性和创造性,能够主动认识自然规律、掌握科学技术,推动生产力实现质的飞跃。纵观人类社会发展史,每一次生产力的革命性突破,无不是人才的知识积累、技术创新和实践活动的结果。

马克思主义劳动价值论指出,劳动是价值的唯一源泉,不同形态劳动创造的价值存在显著差异,比较复杂的劳动只是自乘的或不如说多倍的简单劳动。科研攻关、技术革新、模式创新、治理提质,本质都是人才智力劳动的具象化。当资本红利、人口红利逐步消退,人才红利、创新红利持续彰显,资源重心从物质要素转向人才要素,是经济发展规律的必然要求。

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是马克思主义的核心观点之一,也是人才成长的终极目标。促进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为每个人提供平等的发展机会、充分的发展空间和多元的发展路径,使人的潜能得到充分释放。同样,人才也是推动生产力发展、创造社会财富、促进文明进步的核心力量。只有集聚大批高素质人才,才能不断突破技术瓶颈、优化生产方式、提升治理效能,从而为全体人民创造更加丰富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

从百年奋斗历程中把握人才密码

回望百年奋斗征程,我们党历来高度重视人才工作,一部党史既是救国、兴国、强国的奋斗史,也是培养人才、团结人才、引领人才、成就人才的发展史。

革命战争年代,党深刻认识到人才对事业发展的重要作用。长征胜利初到陕北,面对红军人数锐减、人才极端匮乏的现状,中共中央及时调整人才政策,在长期革命实践中,提出“没有知识分子的参加,革命的胜利是不可能的”著名论断。全面抗战时期,党中央创办抗日军政大学等学校,制定吸引知识分子的政策,延安成为汇聚爱国青年和知识分子的重要阵地,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奠定了人才基础。

新中国成立后,党团结带领广大知识分子和科技人才投身社会主义建设,搭建起国家工业化基础框架,为“两弹一星”等重大科技成就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邓小平提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倡导“尊重知识、尊重人才”。江泽民同志提出“人才资源”理念,实施“科教兴国”战略,胡锦涛同志提出“人才强国”战略。一直以来,党不断完善人才政策,为社会主义建设和发展提供了充足的人才保障。

回首过去,党的百年奋斗历程充分证明,人才工作的成效与党的事业息息相关,人才工作卓有成效之时,也是党的事业蓬勃发展之际。

从中国式现代化实践中彰显人才时代担当

进入新时代,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统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2021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任在中央人才工作会议上深刻指出:“当前,我国进入了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的新征程,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加接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目标,也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加渴求人才。”

渴求人才,源于中国式现代化的时代需求。中国式现代化是人口规模巨大、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体量之大、难度之高、任务之重,前所未有。唯有锻造规模宏大、素质优良的人才队伍,才能破解发展瓶颈,夯实现代化建设的人才基础,实现高质量发展。

渴求人才,来自科技自立自强的紧迫现实考验。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全球科技竞争日趋激烈,关键核心技术博弈本质是顶尖人才的比拼。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离不开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离不开新质生产力提质增效,无论是人工智能等前沿赛道,还是高端制造等实体经济领域,都亟须战略科学家、一线工程师、技能工匠、青年科技人才攻坚克难。

渴求人才,落脚于复兴伟业永续发展的长远大计。纵观人类文明史,大国的兴衰更替无不与人才得失紧密相连。追赶超越西方国家、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需要人才,保持领先地位、让复兴伟业永续发展更需要人才,人才是我们行稳致远的压舱石。

我们必须牢牢把握“人才是第一资源”这一科学论断的深刻内涵,让各类人才的创造活力竞相迸发、聪明才智充分涌流,为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汇聚磅礴力量。

(作者分别为华中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华中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

人才何以成为第一资源

钟德涛 桂展鹏

青马在线

正视AI“成长的烦恼”

郁思奇

你在对话框里精心打磨词元,AI给出的却是一个人物和情节错乱的视频;你本想探寻真知灼见,扑面而来的却是言之无物、逻辑混乱的AI生成“水文”……更深层的问题是,AI浪潮中,一座座数据中心的电表在疯狂飞转,冷却系统每小时吞噬的淡水量和人类“抢水”……人工智能一边展现着惊人的创造力,一边又暴露着惊人的能耗、低质的产出与越来越多的伦理问题。

于是,这个问题逐渐升级为严肃的公共议题——我们是不是该给这头狂奔的“巨兽”勒紧缰绳,甚至踩下急刹车?社交媒体上对“人工智障”群嘲、全球超千名AI从业者对放缓AI发展速度的呼吁,“发展还是暂缓”的争议,真切地摆在了我们面前。面对这把锋利的“双刃剑”,回到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或能帮我们看清本质与方向。

从唯物史观出发,人工智能本质是一种革命性的新质生产力。“手推磨产生的是封建主的社会,蒸汽磨产生的是工业资本家的社会。”生产工具的根本性跃迁,历来是社会形态演进的先声。

今天的人工智能,已不单单是替代重复劳动的机器,它开始将人类的某些智慧活动外化、规模化,重塑生产流程与知识获取方式。因此,它对现有产业形态、就

业结构乃至认知习惯的冲击,是先进生产力在开辟道路时不可避免的“创造性破坏”与“阵痛”。蒸汽机车刚问世时,曾被人嘲笑跑不过马车;电力在普及初期,也曾因触电事故而引发社会恐慌。如果因为AI目前生成内容的失真、高能耗以及信息垃圾的泛滥,就以片面的、形而上学的观点主张“暂缓”乃至“封杀”,无疑是因噎废食,背离了人类社会螺旋式上升的客观规律。

可是,仅仅站在生产力一端欢呼是苍白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揭示了技术从来不是在真空中运行,而是在特定的生产关系与社会逻辑中被应用的。这就解释了为何同样一个AI引擎,既可以被用来制造“文字垃圾”,也可以被用来辅助科研、优化医疗、传承文化遗产。在资本无限增殖的逐利逻辑下,AI“抢水”“吞电”背后,是对算力的不计成本的扩张;它制造看似“蠢笨”的次品与信息粉尘,很大程度上是为了快速填充平台、攫取流量、拉高估值,而非真正服务于人的真实需求。反观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逻辑,则必然要求算力布局的绿色集约、生成内容的向上向善,以及堵住虚假有害信息的生产源头。

这正是当前人工智能争议的深层实质。它并非技术本身的“原罪”,而是新质

生产力和既有生产关系、上层建筑之间阶段性的摩擦。文字垃圾的泛滥,折射的是信息传播秩序的治理滞后;“抢水”“耗电”的焦虑,呼唤的是绿色生产方式的刚性约束;而“一假假”的生态圈被大量生产,暴露的是应用端质量标准的缺失。这些负面现象是次要矛盾和矛盾的次要方面。必须清醒地看到,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始终是人工智能赋能高质量发展、助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强大引擎作用。关键在于运用辩证思维,坚持两点论与重点论的统一,用不断发展、完善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与上层建筑,去驾驭、驯导这匹代表先进生产力的烈马。

破局的关键路径,在这一马克思主义的规律性认识之中。

一是以顶层设计的刚性约束划定边界。针对能耗、内容安全等突出顽疾,党和政府应加快构建体现绿色、安全、公平价值导向的法律法规体系。要为AI大模型的训练与推理制定能耗、水耗的准入与梯度退出机制,依法重拳整治AI批量生成的虚假、有害信息,强化平台的主体责任,让“排污者”付出代价,从源头上净化信息生态。

二是构建多元协同的善治生态。在国家宏观指引下,激发企业、平台与社会组织的共治活力。企业须将社会责任内

嵌于算法的“基因”,摒弃唯流量、唯速度的野蛮生长逻辑,在提升模型准确度、降低“智障”率上下功夫;平台应建立可追溯、可问责的审核闭环,对AI生成内容进行显著标识,防止劣质信息淹没优质内容;学术界和媒体则需构建起冷静的伦理审视空间,对技术异化保持清醒警觉。

三是夯实每一个现实的人的主体地位。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面对AI生成的海量“文字垃圾”,社会需要数字素养启蒙。我们要培养的不只是善用AI指令的操作者,更是能对AI产出进行批判性审视、驾驭技术的自觉主体。提升个体不可替代的创造性思维、批判性意识和情感能力,这些是机器难以复制的人的本质力量,才是我们在智能时代的立身之本。

每一种事物好像都包含有自己的反面,人工智能也是如此。它能耗巨大却又能优化能源配置,它制造信息垃圾却也拓展认知疆界,它时而显得“蠢笨”却又孕育着颠覆性的智慧。我们不必在“完美”的假设面前踟蹰不前,更不必因噎废食。以改变世界的实践精神,在发展中规范,在规范中发展,锻造驾驭它的智慧。

【作者单位为中国地质大学(武汉)马克思主义学院】

宝相花为何变成了四叶花

余思淼

更是对劳动价值的尊重。

但如果四叶花的母题可以上溯到中国的传统纹样,那么LV的独占是否构成对公共文化资源的私人圈占?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剖析“原始积累”时,曾揭露圈地运动如何将公共牧场转化为私有财产。今天,在符号领域,我们正目睹一场隐蔽的“符号圈地”,跨国资本凭借强大的法律优势、设计能力和传播网络,将人类文化长河中的通用元素,逐步吸纳、改造并注册为排他性的商业标识。当某个传统元素被某一资本体系系统性投入商业使用后,它就在公众认知中与该品牌形成了牢不可破的绑定关系。于是矛盾出现了,在文化记忆中,那是属于每个人的宝相花;在市场认知中,它却变成了属于特定

企业的四叶花。在资本逻辑之下,公共文化空间被逐步“抽空”,公众的焦虑,正是对这一现象的抵抗。

承认“圈地”的不公,并不意味着在为茉莉奶白辨护。在高度竞争的市场环境下,品牌的符号构建是一项漫长而昂贵的过程,需要大量创造性劳动。一些资本选择一条捷径,寄望于用似曾相识的符号,这其实也是对传统文化本身的矮化。真正的传统文化复兴,是让宝相花等元素经过当代设计的创造性劳动,产生全新的、能够代表中国跨国的现代商业符号,而不是让它们沦为跨国资本符号体系的附属品或“山寨”版本。

真正的文化自信,不是拒斥规则,而是有能力在既定规则之下,创造出不

可替代的、有深度劳动含量的文化表达。这意味着,我们要勇敢地承认知识产权制度在现阶段存在的合理性,同时清醒地看到里面的改善空间。这也要求我们,在挖掘宝相花、柿蒂纹、敦煌藻井等公共遗产时,投入真实的设计劳动,赋予它们属于这个时代的风格,让它们成为带有中国印记、又能走向世界的新型商业符号。打破跨国资本对某些视觉符号的垄断,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从“被圈占”的焦虑中解放出来,变成激发全社会创新活力的丰沃公地,这需要我们用创造性劳动浇灌传统之花,而不是在别人的阴影下催熟自己的果实。

(作者为南京航空航天大学硕士研究生)

一枚小小的四叶花,将国际奢侈品牌、本土茶饮与千年传统纹样同时推上风口浪尖。苏州中院一审判决茉莉奶白赔偿LV1030万元,这表面上是法律问题,实际却是关于文化符号所有权、资本逻辑与公共传统的深层博弈。

从法律层面来看,此次判决并不存在太大争议。因为LV的四叶花凝结了品牌长年累月的资本投入、工艺叙事、广告宣传与消费体验,这些正是被法律视为“商业标识”的无形劳动沉淀。商标法所保护的是商业体系所凝聚的抽象劳动与市场信任。茉莉奶白在明知商标注册被屡次驳回后,依然将近似图形铺满全国门店,这在本质上,是对他人劳动成果的占有。因此,法院判决维护的不仅是法律条文,